

- 1996年第3期，第82页。
- (93)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中)，《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第94页；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二)》，《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17—18页。
- (94)转引自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二)》，《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18页。
- (95)参见徐百永《国民政府治藏政策及其实施研究(1927-1949)》，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年，第124—128页。
- (96)《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人民日报》1949年9月3日，第1版。
- (97)《“立群电台”文电选》之“关于新疆特区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49年8月21日)、《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开会讨论和平起义的一些情况》(1949年9月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4页。
- (98)参见陈扬勇《〈共同纲领〉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兼谈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第17页。
- (99)周恩来：《〈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1949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96页。
- (100)周恩来：《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修改》(1949年9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366-367页。
- (101)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1949年9月7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140页。
- (102)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1949年9月7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40页。
- (103)《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二野前委的指示》(194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论 文】

中国西部民族宗教格局与民族关系新趋势¹

石 硕

今天非常荣幸，我们2011计划“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第一个讲座由我来开讲。我今天这个题目比较大，叫“中国西部民族宗教格局与民族关系新趋势”。我主要讲四个问题，第一，中国的民族特点，第二，中国西部民族的分布及特点，第三，中国西部的民族宗教格局，第四，当前民族关系变化的新趋势。

引言：民族的界定

¹ 本文是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教授2013年4月25日“西部边疆论坛”第一期讲座的录音整理。该论坛由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录音整理人：穆天钊、戚西川、黄钰。



首先给民族做一个界定。在西方民族叫“Ethnic group”，通常指自然的族群，它是指人们在自然的交往互动中，被认为或自认为具有共同起源、共同世系、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畴。我国的“民族”实际上是被制度化了的族群。我们国家有 56 个民族，这是国家经过民族识别、调查然后确定的。实际上除了 56 个民族还有很多类似族群这样一种人们共同体，它没有被制度化。我们的国家民委过去用的英文翻译是“nationality”，但是由于被制度化的族群共同体往往有一定的自治要求，并且有追寻政治疆域化的倾向，所以，现在国家民委将民族的英文翻译改成了 Ethnic group，这是一个变化。但总体来说，民族是按照文化来划分的人群，但这里面有两种，一种是制度化的，一种是非制度化的。

世界上国家和民族之间总有纠缠不清的关系。总的来说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单一民族国家，比如亚洲的韩国、日本。但这种国家类型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少的，而且像韩国的宪法过去表述自己是单一民族国家，但是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很多比如说蒙古族到那个地方定居，所以它的宪法现在也作了相应修改，把自己定位为多元文化国家。另一种类型是多民族国家，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移民国家，比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还有一种是世居的多民族国家，我们中国就是。在我们的疆域版图内，大部分民族的祖先世代都生活在这里。在近代产生过一个概念叫“民族国家”，就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最早是这样一种观念，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形成是各种因素决定的，所以单一民族国家这种类型越来越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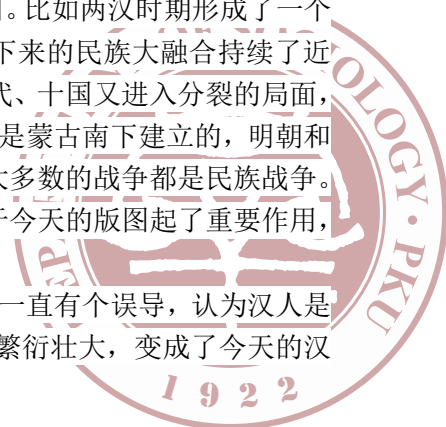
我国古代用某某族、某某人等概念，比如满人、藏人等，没有明确的现在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辛亥革命时提的一个口号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实这个就是把满族当作“鞑虏”、北方游牧民族来看待，当时“中华”概念主要是指汉人地区。1912 年推翻清朝之后孙中山马上意识到这个口号非常危险，因为新建立的共和国如果把“鞑虏”划出去，北方的很大一片领土就没有了，因此，这个口号到共和国一建立，就变为“五族共和”，就是汉、满、蒙、回、藏的共和。当时中国的民族概念主要是这五族，但“回”是包含了维吾尔族。民国时期谈到“民族”主要就是这五族。今天的 56 个民族是我国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进行民族识别的结果。民族识别从 53 年开始，一直到 1987 年结束。1987 年国家民委发表了一个公告，宣布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工作基本完成。1987 年之后还有很多未识别人群的要求认证他们是一个民族，但是目前政策层面这个工作已经基本停止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疆域内只有 56 个族群。民族只是制度化的族群共同体。这就是国家认定的 56 个民族。

一、中国的民族特点

从民族的角度看，我认为中国有三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世居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内现在的 56 个民族及其祖先，几千年来都一直生活在这个地域内。大家去翻一翻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并不断重组我们这个版图和帝国。比如两汉时期形成了一个比较长期的中原王朝，但是到东汉末年北方“五胡”就进来了，接下来的民族大融合持续了近 400 多年，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隋、唐这两个强盛的王朝。唐以后五代、十国又进入分裂的局面，两宋时期其实是第二个南北朝时期，因为宋朝的江山只有半壁。元朝是蒙古南下建立的，明朝和蒙古是两分天下，清朝则是满人入主中原建立的。所以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战争都是民族战争。中国今天的版图是 56 个民族及其祖先共同缔造的。其实很多民族对于今天的版图起了重要作用，比如元朝、清朝。中国今天的版图构架也主要是清朝时候形成的。

第二，汉族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产物。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一直有个误导，认为汉人是炎黄子孙，最早在黄河流域形成了“华夏”，后来这个华夏人群逐渐繁衍壮大，变成了今天的汉



族。其实汉族的形成过程完全不是这样。汉族是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民族融合的产物。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一浪又一浪地进入中原农耕地区，成为源源不断地汇入汉族的新鲜血液。同时汉族受北方游牧民族挤压不断向南开拓，也同化或融合了其他南方少数民族。所以，今天的汉族是融合出来的一个民族，是同化和融合所有进入中原农耕地区的民族而形成的民族。从族群成分来说汉族是一个最大的混合体。正因为如此，汉族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民族意识不强。新疆“7.5”的时候出现了汉人上街游行，后来我到新疆了解到他们喊的都不是民族口号，而是觉得政府没有能够保护他们。汉族在血缘上、宗教上都是不排他的。原因是他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汉族是一个复合型的民族，从这一点上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线。就是今天，汉族和所有的少数民族还在不断的通婚和融合。我们今天的宣传还有一个缺点，认为 56 个民族一旦确立就是固化和不变的。其实在现实生活层面今天汉族与其他民族仍然无时不在发生交流与融合。文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民族也是这样。

第三，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人口和占地面积上异常悬殊。这是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六普数据显示，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 91.5%，占地面积却只有 39%。但是少数民族人口只占 8.4%，占地面积却占中国版图的 60%，所以我觉得要认识中国国情的话，这就是最大的国情。看不到这个国情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就非常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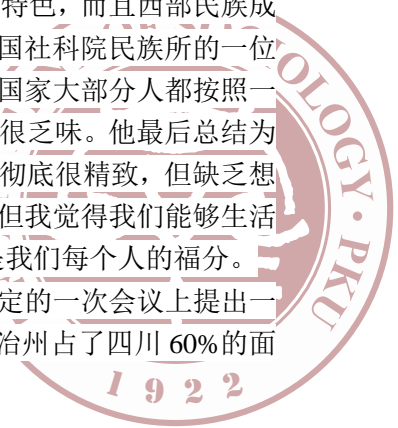
二、中国西部民族的分布及特点

中国的地形分为三个阶梯：第一阶梯是青藏高原，第二阶梯是内蒙、云贵、黄土高原，第三阶梯是内地和沿海地区。实际上，中国的地形和民族分布关系非常明显。目前国家认定的西部概念是“10+2+2”，即：“10”就是西北五省区和西南五省区，第一个“+2”是广西和内蒙，第二个“+2”是湖南湘西和湖北恩施这两个苗族、土家族自治州。西部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 71.4%，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22%。另外，西部是中国最主要的陆地边疆，和 14 个国家接壤，有 1.8 万公里的边境线，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 91%。此外还有 1/10 的海岸线。中国的少数民族西部占了 44 个，是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我们过去说的“老、少、边、穷”，西部有两个最突出，一个是“少”，一个是“边”，这两个又都和“穷”即发展滞后有一定的关系。由此，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我们西部的特点。

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 1935 年划了一条线，就是从黑龙江的黑河（这个地方当时叫瑗瑗）到云南腾冲的“胡焕庸线”。他发现这条线的倾斜度大致是 45 度，线的东南方占 36% 的国土，居住了 96% 的人口。而另一半近 64% 的国土只居住了 4% 的人口。为什么这么大的面积人口这么少，其主要原因就是少数民族。西部地广人稀，目前占全国 60% 的土地面积上居住了全国 8% 的人口。所以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国情，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在民族方面一定不能出事，一旦出事可能半壁江山就会失去。我们的长江、黄河两大河流都是从青藏高原下来的，不能没有青藏高原、蒙古草原。这是我们在西部发展中需要高度关注的。

西部最大的特色是民族和边疆两个要素。少数民族是中国西部的主要特色，而且西部民族成分复杂，支系繁多，文化多样性十分突出。我几年前在重庆开会时遇到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的一位先生，他是著名的西夏专家，他在日本待了两年，感觉很乏味，单一民族国家大部分人都按照一个模式生活，文化单一性让他这种经常接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觉得很乏味。他最后总结为什么日本会成为一个工具性民族，以拼命工作为宗旨，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彻底很精致，但缺乏想象力和抽象力，应和他们的文化单一性有关。当然，这是他个人的感受。但我觉得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文化多样性突出，有各种不同语言、服饰、生活方式的国家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福分。

西部有 91% 的陆地边境线，多年前中国国家地理主编单之蔷先生在康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一个观点，说四川有点像中国的缩影，四川西部的阿坝、甘孜、凉山三个自治州占了四川 60% 的面



积，但是这个地区人非常少而且是少数民族区域。大部分的人都挤在东部不到 40%的版图之内。现在想来，这个比喻还真有点形象。

三、中国西部的民族、宗教格局

（一）中国西部的民族格局

中国西部有三个最大的民族聚居板块。一个是藏区，一个是新疆，一个是内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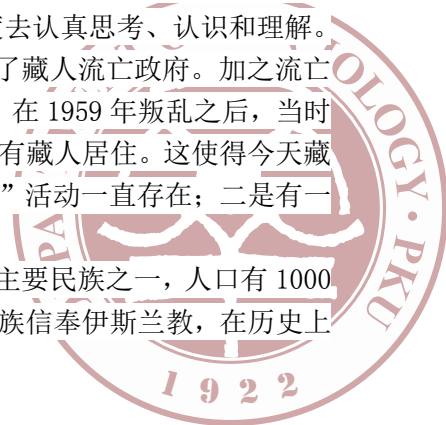
第一个板块是藏族分布的青藏高原。藏族人口六普的数据是 600 多万。藏族是世界上非常独特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基本覆盖青藏高原，主要生活在海拔 3000 米及以上区域。像青藏高原这样的高海拔地区严格说并不太适宜人的居住，但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却创造了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和厚重的文化来适应了高原环境。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这意味着世界又只有一个青藏高原，从这个角度说，藏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价值的。

我们要知道人类可以如何在高海拔地区生活，高原环境可以产生怎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藏族就回答了这个问题。青藏高原占我国国土面积的约四分之一。藏族主要信奉藏传佛教。藏族的文明有一个特点，它是农牧混合，且农牧兼有。我们知道过去北方草原上都是游牧民族，游牧的生产方式具有非常大的流动性、进攻性和扩张性。但是农耕地区可以形成一套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西藏的拉萨和日喀则地区是高原上最好的农区，完全是一个定居社会，所以宗教那么发达，文化那么厚重。可以说，农和牧的结合是藏族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今天藏族也是跨国境分布，在印度、尼泊尔、不丹都有大量的藏人社区。还有，藏传佛教文化圈的范围远大于藏族的分布范围，这一点非常重要。其实在西南的纳西族地区和川西很多地区的居民不是藏族，但也信仰藏传佛教。所以如果以藏传佛教文化圈来划分，这个范围就非常大。藏族最大的特点是高原地域生活方式和信仰藏传佛教。

其实藏区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文化差异也很大。但是它有两点是共通的：第一，高原地域特点。高原有牦牛，再加上他的饮食，由于高原上东西是煮不熟的，要吃糌粑，也吃牦牛所提供的高热量的酥油。藏族人民很智慧的把青稞制成炒面，做成酥油糌粑，这是他们的基本饮食。这种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青藏高原各地都一样，包括服饰的基本型式等。这一套生活方式实际上是由于高原地域环境决定的。第二，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是一套与高原环境相匹配的价值系统。很多去西藏旅游的内地游客对藏人如此虔诚地信仰藏传佛教很好奇，也很不理解。认为他们把大量财富送到寺庙去，而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十分可惜。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高原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是不适宜无限度扩大再生产的。藏传佛教至少有三个明显的作用，一，它减少了人口增长，二，减少了人的物质欲望，三，也减少了扩大再生产，这是藏传佛教很重要的社会功能。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大多数藏人都满脑子功名利禄，都贪恋物质享受，他们可能在那样严酷的高原环境中生存和延续吗？所以，一个世俗化的藏族社会，无论对藏族还是对于他们生存的高原环境，可能都是更大的灾难。受藏传佛教影响，藏族的价值观和内地差异很大，特别是对现世、对物质财富的态度也很不一样，这一点需要我们从跨文化的角度去认真思考、认识和理解。

1959 年西藏上层叛乱后，很大一批藏人流亡出去，在印度建立了藏人流亡政府。加之流亡政府同国内藏区存在各种联系，所以，“藏独”势力和活动一直存在。在 1959 年叛乱之后，当时联合国让一些西方国家分担西藏流亡人员，所以今天在欧洲、美国都有藏人居住。这使得今天藏人在世界上分布较广。所以，今天西藏问题有两个特点：一是“藏独”活动一直存在；二是有一个国际化的背景。因此，藏区是我们西部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

第二个板块是新疆，是维吾尔族分布的区域。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要民族之一，人口有 1000 万，占现在新疆人口的 45%，除此之外，新疆还有其他民族。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在历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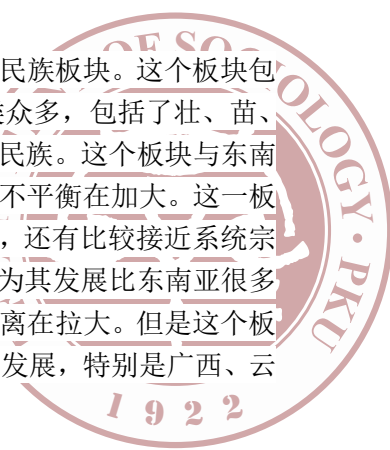


曾经信奉过佛教，后来在八、九世纪时，伊斯兰教进来后逐渐伊斯兰化。现在新疆维吾尔族是农业为主，过去是农牧为主。近代以来新疆一直存在着独立倾向，所以它有“泛突厥主义”，也称“东突”。新疆很多民族是突厥语族，突厥在隋唐前期是强大的民族，非常厉害，唐朝建立的过程中还曾向突厥可汗写信求得支持。唐后来向突厥发起进攻，突厥很大一部分西迁。今天从新疆到中亚和土耳其一带很大一部分是突厥语民族。今天的新疆维吾尔人到土耳其去一个月左右语言基本就通了。在十八、十九世纪新疆一直存在泛突厥主义思潮，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东突”，受到了中亚包括土耳其等国的支持。所以东突开始走向国际化，境外在语言和宗教上与维吾尔存在着很大的共性。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他的价值观也和内地有很大的差异。新疆的矛盾是最尖锐的，因为在民国时期新疆几经反复，独立倾向很强，所以国家从 50 年代开始在新疆建立建设兵团。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制衡措施。新疆建设兵团是一个省级的独立的系统，它可以开垦，造成了大量汉人的进入。今天汉人大约占了 40%，维吾尔是 45%，回、哈萨克等族人数比较少。所以新疆“7.5”事件很大程度反映的是维、汉之间的矛盾。

第三个板块是内蒙地区的蒙古族。蒙古是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但是今天内蒙地区汉人比例较高。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清代已经有很多汉人进去了。现在到内蒙去看，农业化速度非常快，现在只有内蒙东部有很好的草原，如锡林郭勒、呼伦贝尔等。大部分地区都进行了开垦，因为农耕民族的习惯是见了土地就挖来种，农业养活的人要多一些，导致大量汉人进去。汉人现在占了 78%，蒙古族只占 17%。内蒙和外蒙接壤，由于外蒙的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内蒙好，所以今天它的独立的倾向还没有体现出来。但是这几年蒙古族往外发展很厉害，内蒙地区的蒙古族接受汉文化比较多。有一首歌叫“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台湾蒙古族作家席慕容写的词，其中一句歌词叫“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这基本上是蒙古地区很普遍的现象，它也说明了蒙古族的外向型发展，特别在北京，有非常多的蒙古人那儿发展。我曾参加过他们的几次聚会，喝了酒之后他们有一种失落和伤感。蒙古人的酒量很厉害，因为他们有那么辉煌的历史，曾经是一个那么强大的民族，他们的精英感觉自己的文化在丢失，有一种很深的失落和忧伤。在明末清初蒙古整个皈依藏传佛教，后来清朝用盟旗制度把他固定下来，不让他流动。后来蒙藏隔离，所以今天蒙古的藏传佛教已经非常淡了，他的信仰主要是过去萨满教的一些东西。他与汉族的交融比较大，农业的比重非常高。但是今天相当一部分蒙古族和学者已意识到生态问题十分严重。如果是草原的话，他的含水量是很大的，挖几米就会出水，如果是耕地的话水分都流失了。蒙古草原是整个北方的一个蓄水带，所以农业带来的生态变化非常大，生态问题非常严重。其实蒙古这个民族也是有潜在的独立倾向，只是表现不突出。

从音乐舞蹈看，中国有三个地区最有特色，一是个内蒙，一个是新疆，一个是藏区。艺术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音乐舞蹈是艺术的精髓，从音乐舞蹈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三个板块的文化特色有多鲜明。这三个板块，我认为我们不能简单认为它是中国 56 个民族中的三个民族，其实他是三种文明。为什么这三个板块都会出现独立的倾向，就是因为他和我们内地汉族文化差异很大。有些政治上的事情根子在文化。这三个板块是中国最大的相对单一的民族聚居区，也是西部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民族板块。

除了上面三个相对单一的民族板块外，西部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西南民族板块。这个板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湘西、鄂西等，这个板块的特点是民族种类众多，包括了壮、苗、瑶、侗、傣、彝、纳西等众多民族，而且跨境民族很多，很多是山地农耕民族。这个板块与东南亚接壤，文化多样性突出，但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最近十余年民族间的不平衡在加大。这一板块主要信仰道教、佛教还有原始宗教。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原始宗教，还有比较接近系统宗教并形成了象形文字的东巴教。这个民族板块基本上不存在独立问题，因为其发展比东南亚很多地区要好。这个民族板块的问题主要是在发展层面和内地有较大反差，距离在拉大。但是这个板块跨境的问题很多，包括彝族在越南等等都有。所以也涉及边疆的安全与发展，特别是广西、云



南等与越南等国接壤的地区。

西部主要就是这么四个板块。要把握民族的特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看他的语言系属。西南板块最大的特点是文化多样性突出，有四个语族在这里，一个是藏缅语族，一个是壮侗语族，一个是苗瑶语族，一个是孟高緬语族。孟高緬语族属于南亚语系，苗、瑶、壮、侗、藏语都属于汉藏语系。在西北还有两个主要语族，一个是蒙古语族，包括达斡尔、东乡这些。还有就是突厥语民族，西北很多民族都是突厥语民族。语族相近，很多文化也是相近的。中国的民族大体上说，北方就是阿尔泰语系，从欧洲东部到白令海峡，过去的游牧民族都是阿尔泰语系，蒙古族、突厥语族都是属于阿尔泰语系；而南方基本上是汉藏语系民族。西北和西南这两个大的民族板块之间差异也很大，西北的很多民族在历史上前身都是游牧民族，这些民族流动性很大，变异性也较大，但其文化共通性很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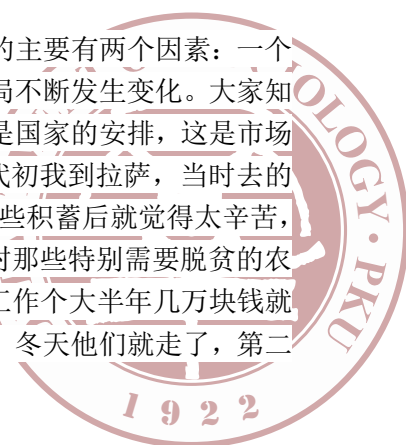
（二）中国西部的宗教格局

从宗教格局上看，西部民族地区主要有三种格局，一个是伊斯兰文化圈，一个是藏传佛教文化圈，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其实今天南方很多民族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仍是原始宗教，有些原始宗教融合了道教、佛教的一些因素。西北民族宗教格局的突出特点就是众多民族信仰同一宗教，宗教的共通性和整体性很强。在西北，有十个民族共同信奉伊斯兰教，就是说他们在信仰上基本是相通的。但彼此也有差异，比如维吾尔族不进甘肃临夏回族开的清真餐馆，因为回族吃马肉，而维吾尔人是不吃的。有一些小的差异，但总体是差不多的。而且这些民族底层文化还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萨满教。

藏传佛教是世界上非常独特的宗教。这个宗教覆盖范围很大。藏传佛教不能简单按内地汉传佛教来理解，它是藏地本土的苯教及很多高原地域的文化观念与佛教结合而形成的宗教。这个宗教在价值观上与内地有很多不一样。我们知道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所以在那个地方只能有限发展，更不能无限扩大再生产，传统的农牧业必须有限度地和地理环境相匹配才能可持续。所以藏族地区形成了有浓厚藏传佛教氛围的宗教性社会，把多余的财富奉献给寺庙，然后维持一种低成本的和自然环境相匹配的生活方式。文化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与智慧，藏族文化是在特殊地理环境下形成的生存智慧。大家知道，藏族的朝圣很多是磕着长头去的，在当今现代文明那么发达的背景下，这在世界上几乎绝无仅有。我到西藏阿里冈仁波切神山去过，终年不绝都有人磕着长头转山，那种对自然的敬畏令人惊叹。藏文化对自然有一种很深的敬畏，这种敬畏使人和生存环境之间形成一种匹配与默契，这种东西也保护了藏族的环境。藏区近几年出现了问题，一些当地政府把矿山包给内地人去开发。老百姓就不答应，因为他们认为土不能随便动，那是他们的神山。藏族文化里有一种最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就是对人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看法。

四、当前民族关系变化的新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推动这种变化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导致民族关系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大家知道，西方一直在抨击我们，说大量的汉人进入西藏和新疆，其实这并不是国家的安排，这是市场经济在起作用。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是跟着钱和机会走的。90年代初我到拉萨，当时去的农民工就是包一些小工程，找村里的一帮人一块儿去做。做了几个工程有些积蓄后就觉得太辛苦，就开餐馆或者卖衣服，然后逐渐做大。人是跟着钱走的，特别是内地农村那些特别需要脱贫的农民工，他们大量进入到民族聚居区，虽然艰苦，但那个地方好挣钱，他工作个大半年几万块钱就能拿到手。特别是我们四川人，在西藏阿里等地区都是四川人在开餐馆。冬天他们就走了，第二



年四、五月份又去，所以市场经济导致民族之间的流动和交流增多。二是城镇化，也叫城市化，其实是一个含义，就是说现代社会发展的布局中，城市不断扩大，而且城镇化带来的机会越来越多，所以很多人都到城镇寻求发展。这两个东西，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其实导致了过去计划经济格局发生改变，也导致了利益蛋糕的重新分配。在这种背景下民族格局和民族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西部地区民族关系的新动向及其影响

目前中国西部民族之间的交往主要出现了三个新的动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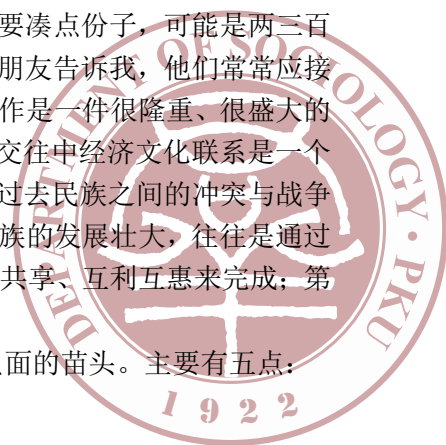
一个是汉族向民族聚居区的流动日益加剧，这个趋势一年比一年强。2006年青藏铁路刚通的那一年，我去拉萨开会，七八月份正值高峰期，拉萨的所有旅店爆满。甚至在周围的曲水、山南这些地方也满了，很多人没办法就扯个小帐篷在布达拉广场上住。甚至一些人想的窍门是去住医院，说自己高原反应不行了，可见在拉萨找一个床位在多么不容易。在2006年、2007年、2008年的夏天，外来人口的数量在短时期甚至超过了拉萨常住人口。过去进藏的成本比较高，坐汽车非常辛苦，坐飞机又太昂贵，在青藏铁路通车以后，西北很多人特别是回族大量到拉萨去开餐馆、做生意，人口一下子急剧膨胀，所以2008年的“3.14事件”其实和那么快的流动人口增长速度所导致的社会管理跟不上有关。“3.14事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大家知道八廓街周围都是卖藏族传统工艺品的商店。从2006年通车，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后带来很大商机。所以很多内地老板去了，把不少八廓街的铺面租下来，比如原来租金是5千元，他出1万。你进去那个店，店员还是藏族，卖的还是藏族传统工艺品，但是老板却换了。换的速度很快，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所以在打砸抢的头一天在内地老板的店门上都做了记号。汉族向民族聚居区的流动这个趋势一年比一年大。新疆也是这样。其它民族地区也是如此。纳西族在成都有个纳西协会，过“三多节”时请了一些民族学界的学者来座谈，他们也很忧虑，现在丽江古城的铺面也全部被外面的人置换了，卖的还是那些东西，但是老板都是外面的人，整个纳西族都逐渐被置换出来，而且数量那么大，他们非常担心大量的汉人向民族聚居区的流动，会给纳西族文化带来很大冲击和负面影响。但这是今天的一个客观形势。

第二个是少数民族由聚居区向内地大中城市的流动。这几年特别是读书的、学习的、打工的，各种生意做的等等，这个流动的人口数量也很大，也在逐年增加。

第三个是在民族地区，民族之间的交往联系也在加强。这个不光是主要城市，在一些次一级的城市里面，这个趋势也在不断的增强。

当前西部民族关系变化的主体趋势还是良性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交流日趋密切。民族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这个趋势很明显。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民族之间交往程度低，民族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固定和静态，像现在这样的大规模流动几乎没有。总体看，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交流日趋密切，这是一个良性的、好的趋势。第二，在民族交往中，经济文化联系成为一种主流。当前的民族交往与流动，经济利益是一个主要驱动力。除此之外还有外出学习、孩子上学等等。现在拉萨形成一种新民俗，凡哪家的小孩考上内地学校或赴内地西藏班学习，这家人都要请客，请客的规模很大，亲朋好友都去，要凑点份子，可能是两三百块钱，有些稍微高一些。到七、八月份这种“上学宴”非常多，藏族朋友告诉我，他们常常应接不暇，有时一天要赶几台。这说明拉萨藏族人是把子女赴内地上学看作是一件很隆重、很盛大的事情。这种情况在其它民族聚居区也普遍存在。所以，在当前的民族交往中经济文化联系是一个主流。第三，在民族交往和联系中，资源共享和互利互惠也是主流。过去民族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很大程度都是为了争夺资源，在历史上这是很残酷的，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发展壮大，往往是通过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来实现。今天不是这样了，民族之间是采取资源共享、互利互惠来完成；第四是当前的民族关系是以沟通和协商占主要的地位。

以上是我国民族关系变化的良性趋势，但是其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苗头。主要有五点：



一个是民族间经济利益上的不平衡加剧。因为现在的发展最有力的一只手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行的，在市场经济面前，有的民族的传统能适应这个，但有的民族由于他的传统和文化等因素就不太适应。所以这 10 多年下来，有些民族就和他相邻的民族经济利益上产生不平衡，出现较大差距。比如我前年去松潘，松潘那个地方主要是藏族、回族和汉族，藏族最多。过去做生意的主要是回族，藏族不太做生意，但是由于九黄机场通航，川主寺一下就发展成比松潘城还要繁荣的一个集镇。这就是带来很大的“利益蛋糕”，于是藏族也开始做生意。藏族做生意在很多方面做不过回族，于是由于利益竞争的原因，藏族和回族之间的矛盾开始上升，关系也变得比较紧张。

二是一些民族的挫折感在增加。我们在内地可能不太体会得到，很多民族地区的年轻人到内地走了一趟以后，虽然开了眼界，但是回到当地却有很深的挫折感，他们说生来都是一样的人，他们生活在那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这里这么差。这种挫折感，极易导致民族极端情绪的膨胀。比如，过去一些民族聚居区的学生到内地去读中学、大学，现在他们当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已经回到当地，分到机关里面，人们发现这批人的民族情绪非常强，有的甚至有一种很仇恨心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在内地受了七、八年的教育，很多是中学时期就到内地读书了，原因是他们到了内地的学校被分到一个班里，他们和学校其他班的学生成绩悬殊，落差很大。落差大了，他们就有一种自卑感，越自卑就抱得越紧，和周围的人交流比较少。这种情况长期保持下来，落差带来挫折感，挫折感产生自卑心理，自卑心理可能引起民族极端情绪的膨胀。50、60 年代老一辈藏族人，特别是十八军那个时候培养的人，那个时候民族关系之融洽，民族之间互帮互助所结下友好情感，创造了很多很好的模范实例。真值得我们好好总结和借鉴。

三是利益竞争开始引起文化和信仰上的冲突与排斥。这在西北地区特别明显，因为西北很多是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交错的区域，回族很会开饭馆，他不断的把饭馆开到藏族地区，藏族就不高兴，他采取的方式就是弄一个猪头晚上就扔在别人院子里，这种利益上的竞争开始演化为宗教和文化上的相互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开始成为一种利益竞争的攻击目标。

第四点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平衡使民族间的潜在的矛盾加剧。其实在“7.5 事件”之前，我有一些朋友是专门研究新疆的，他们当时就说，新疆早晚要出事。因为很长时期中央援藏的力度比较大，对新疆却是大部分把资源运走，给的补偿很少。当时就有人给中央提出，新疆如果现在不花钱搞建设，今后就是花钱打仗。在“7.5 事件”后，国家加大了援疆力度。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维吾尔南疆地区普遍的贫困，这个确实比较严重，就是说有些民族由于地域环境、文化传统等历史条件，在市场经济环境越来越处于弱势，这种情况使其挫折感、自卑、强烈的民族极端情绪就开始膨胀，新疆就是一个例子。在“7.5 事件”之后我到过新疆，现在新疆的建设中，由于落差的时间比较长，在短期内你给他很多东西他还不太接受，情绪上还有些抵触，但是我觉得随着许多条件的改善，会逐渐的向好方面的转变。

第五点是在民族聚居区突发事件增多，社会管理成本不断加高。我们在民族聚居区的社会管理成本正在不断上升。这个成本非常高。包括现在在藏区，特别是出现僧人自焚之后，为了防止僧人自焚，成本非常高。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说在拉萨旅游旺季的时候，有一个人确实是大热了，他拿了一瓶矿泉水往头上一浇，结果马上就被几个人给按到了。你想他们那么大一个地方要有多少人来防范。包括新疆、西藏，社会管理成本都在提高。

（二）民族关系的新趋势

其实我们政府一直在考虑，在今天由于市场经济、城镇化导致的民族格局和民族关系迅速变化，带来很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的背景下，政府应该做什么。我想，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一个新的选择。

其中有一个重要苗头，就是从去年开始，民族学界有人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最早提出这方面思路的是北京大学的马戎教授，他是一位学者，在美国待了多年，他到我们四川大学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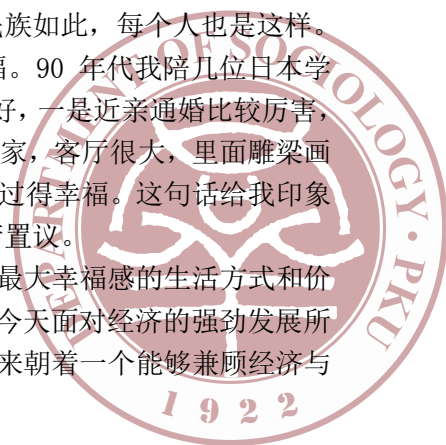


藏学所做过几次报告，很受欢迎。几年前他提出一个观点，主张民族“去政治化”，他一直主张我们要借鉴西方与国外的发展经验和教训。“第二代民族政策”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胡联合在《新疆师大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说白了就是主张淡化民族意识，淡化民族的界限和观念，强调身份意识、公民意识，推进民族的融合、一体化和国家认同。主要是效仿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并且提出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我们虽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是不能让该民族在自治区产生一种领土的意识，更不能排斥其他的民族。

“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后，民族学界有很多猜测，一种猜测就是可能我们国家最高层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会不会是有某种背景的“试水”。从去年开始，在全国的很多民族会议上，“第二代民族政策”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争议很大。报刊上也有很多争论。很大部分的人是坚决反对。特别是少数民族学者，认为这会带来很大问题。另一些是相当一批民族学界很资深的学者，包括熟悉民族情况、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学者。这个并不奇怪，其实任何一个新的东西出现都会遭到反对，反对恰恰是对它最好的修正。但我觉得“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出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空穴来风，它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我国当前民族格局、民族关系发生了很大改变的情况下，客观上要求一种新的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政策来应对这种变化了的状态。当然，民族政策是件大事，需要非常慎重，目前用很新、很激进的手段来改变可能很容易出问题。“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实质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合”。但中国数千年历史，疆域如此辽阔，民族如此众多，文化差异和多样性如此突出，简单用一个“合”字来解决当前的民族和文化差异问题恐怕是不行的。我认为现阶段，或者说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处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可能都必须围绕“和”这个字来下功夫，也就是费老所说的民族与文化之间“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历史上的变革走急了都会引起很大的动乱。这里面可能要考虑社会现实所允许的接受度。不能罔顾现实盲目冒进和简单超越。我们的政府也在考虑这些问题，有些东西正在慢慢的转变，需要有一个过程。今天西部民族关系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已经给我们很大的警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前面提到三个民族聚居板块，是非常棘手的。历史上清朝的若干皇帝在处理民族关系的事务上就费尽心思。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民族关系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我觉得处理民族关系包含这么几个东西：一是如何协调、兼顾传统与现实。认识今天我国民族关系、民族格局变化的新趋势和特点，一定要了解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既有的传统，了解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才能准确把握他的现实与未来。二是处理民族关系暗含这样一个前提，如何对待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当今世界范围经济一体化趋势虽然在增强，特别是网络使很多东西全球都趋向一致，但是文化的冲突和多样性却并未因此减少。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在世界范围看到的很多例子，有些民族在追求发展和富裕的时候会主动丢弃自己的传统，一旦富裕之后又会反过来强调自己的文化与传统。比如，台湾的原住民，过去大部分都信奉了基督教、天主教，但是现在又都回到自己的宗教上去了。说明在富裕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人是需要文化的。对人的幸福而言，经济和文化都起很重要的作用，一个民族如此，每个人也是这样。在没有钱的时候拼命挣钱，但是有了钱之后，把文化丢了就没有幸福。90年代我陪几位日本学者到岷江上游去考察，开始走了很多羌寨，那个时候羌寨的情况很不好，一是近亲通婚比较厉害，二是经济上普遍贫困。最后我们来到米亚罗一带，进了藏寨的一户人家，客厅很大，里面雕梁画柱，很有文化氛围，一位日本教授当即感叹道，藏人一定比羌寨的人过得幸福。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当然他是从他的角度看。但文化对一个民族幸福感的影响勿庸置疑。

人类学对文化有一个定义：文化是能够给拥有该文化的人群带来最大幸福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这种生活方式自然还包括了价值观，包括传统和习惯等等。今天面对经济的强劲发展所带来的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的变化，我们需要选择未来的方向，怎样来朝着一个能够兼顾经济与



文化，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富裕社会的目标迈进？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思考的。两年前我在北京参加教育部民族学学部召开的一个会议，当时正是新疆“7.5事件”后不久，会上大家有一个共识，认为应该在综合性大学开设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方面的通识课。因为多民族国家是我国的重要国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了解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来历，认识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应该学会对待异文化，树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化态度，这是作为现代人的一种基本素质和文化修养。我认为，尽管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但如果轻率地忽视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差异，走得急了也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甚至出现动荡，其中特别是要考虑到民族地区的广大少数民族民众的意愿，考虑少数民族精英人士的承受力。

【论 文】

从美国黑人劳动力的教育和职业结构变迁 状况看“肯定性行动”的变迁

——以 CPS 数据为例

王凡妹

摘要：本文以美国“当代人口调查”数据为依托，对美国黑白男性和女性群体近 50 年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结构的变迁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论证了“肯定性行动”在 90 年代初期时由“优待”走向“平等”的合理性，并对该项政策的下一步走向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美国黑人劳动力，教育，职业结构，“肯定性行动”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调整民族优惠政策观点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2011 年，学者胡鞍钢和胡联合发表“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一文，明确提出为“顺应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潮流”，需要“推动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1}，“把对以族群（民族）成分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调整为对处于贫困弱势处境的公民为优惠照顾帮扶对象的政策”^{[1](7)}。这篇文章直指我国已经实施了“60 多年”并“形成强大历史惯性”^{[2](6)}的各项民族优惠政策，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反响。在批驳“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文章中，大多是通过驳斥文章提供的论据，进而对其观点进行反驳。

两位胡教授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大熔炉模式”是“解决民族（种族）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1](3)}。学者郝时远针对这一点指出，“以（美国）‘肯定性行动’为代表的具有‘优惠’、‘照顾’、‘倾斜’特点的政策”，“就凸显了‘种族’和‘族群’等身份”^{[3](5)}。不过，郝文也指出，“肯定性行动”现如今呈现出“式微之势”^{[3](6)}。这就提醒我们，在分析美国的种族或族群政策时，需要动态地看待问题。

上个世纪 60 年代伊始，美国联邦政府推出了“肯定性行动”政策。在 40 余年的实践过程中，这项政策先后经历了“维权时期”、“优待时期”和“平等时期”，亦即，先是由强调维护少数种族或族群之权益转变为优待或照顾少数种族或族群，如今又有越来越多的州通过修订州宪法或法律的形式宣布，政策旨在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各项带有明显种族或族群意识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若想通过美国司法体系的“严格审查”标准，必须打着多元化的旗号，以灵活多变的方式进

